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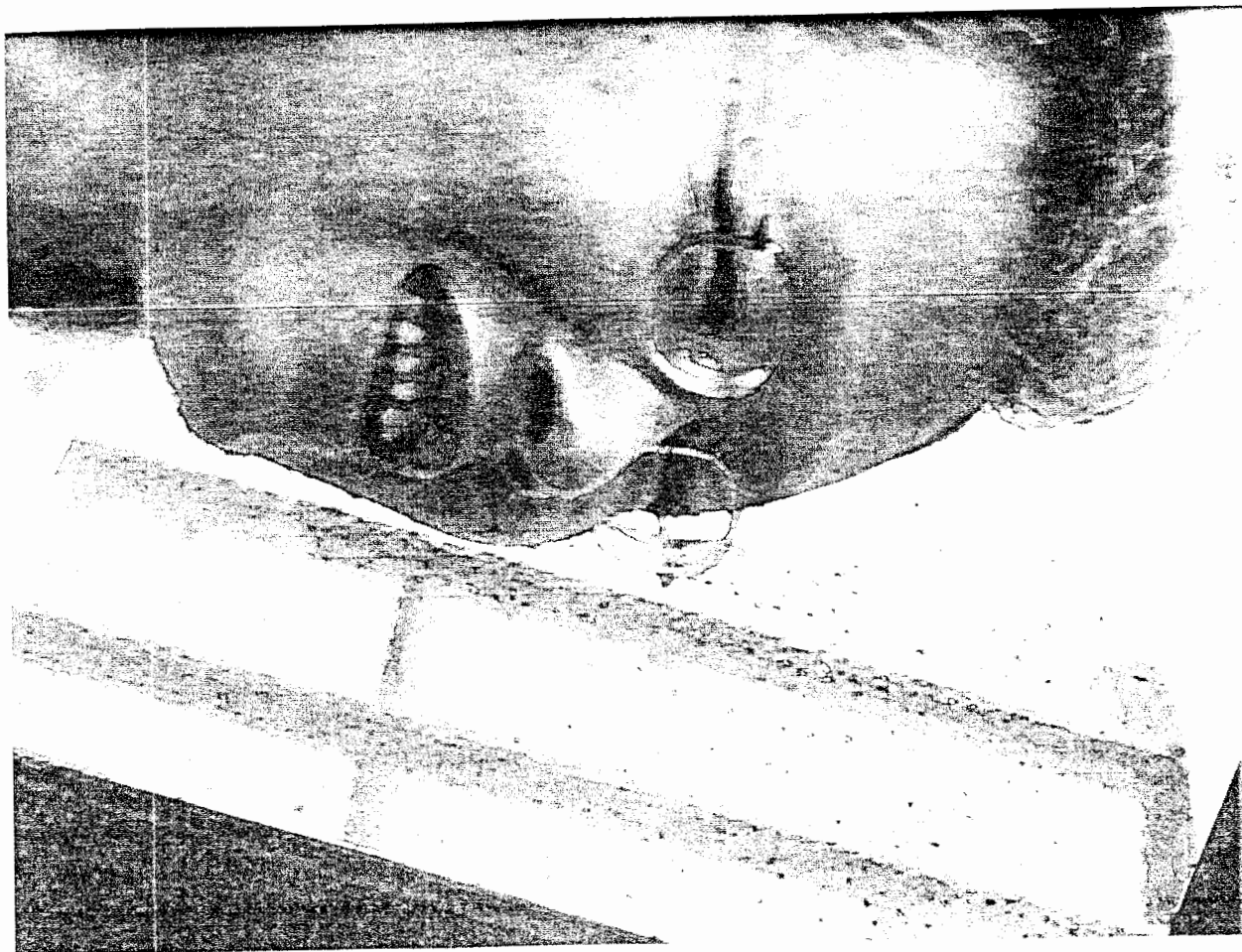
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價，
成然仍扎着，担起釐政
帶着他的困惑和遺憾。

史家高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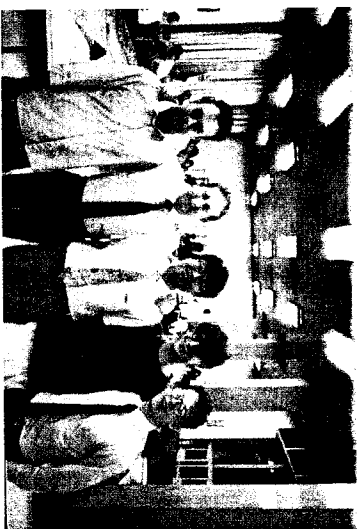
熊賢明 康曉 主編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1994-2011



◎史家高華



- 1. 5
- 2. 6
- 3. 6
- 4. 6

1.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理事长白山，香港
 2. 与南大中美文化交流中心学生
 3. 研讨会，香港
 4. 拜访李锐先生
 5. 东平书芳
 6. 任妮，上海

异化不了的学者

甘思德

我所认识的中国学者中，高华的英语能力可能是最差的。但他大概是我在中国碰到的学者之中，甚至我在世界任何地方接触过的学者中，最杰出的一位。尽管高华无法说出简单的英语短语，但他对西方和世界历史的知识与理解却令人惊叹。他毕生致力于对重大问题的实证研究，展示了彻底的人文主义精神，他的研究与精神超越了文化与国界。从柏林到波士顿，从希腊到悉尼，高华的崇拜者遍布各国。

我初次认识高华是在1991年9月的一天早上，当时我是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，选修高华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课程。在此之前，我曾经到中国学习过中文，后来又台湾继续学习一年，然后开始在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开始我的硕士课程。去南京之前，我已经在华盛顿校区完成了一年的政治学与经济学课程。到南京前的那个夏天，我结了婚，在台北呆了两个月，和新婚妻子 Mary Beth 在那学习中文并教授英语。到南京后，我和她分开了：我和室友住在中美中心，而她住在城市另一端的南京航空学院。

“中美中心”相当独特，是两国间第一个专注于中美两国研究课程的

合作项目。“中心”拥有当时中国唯一的开架式图书馆，中英文藏书少而精，学生可以自由阅读研究资料。

但严格地说，“中心”并非一个和谐、充满学术自由与文化理解的地方。它不过是中国社会大环境与复杂的中美关系的一部分而已（尽管有几位非美国籍的国际学生，整个“中心”强调中美关系研究）。中美室友往往成为朋友，但也偶尔会有强烈的分歧，而且存在大量的文化误解。中国学生们喜欢自己一起活动，在学校餐厅吃饭，而美国学生也更愿意一起到校外吃饭。

“中心”也被政治所涉及。中国学生必须定期参加政治学习，还有一个学生干部维持秩序。两年前，即1989年，“中心”的中国学生参与了政治行动，使得中心的领导非常不满意。另外我也确信中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当时很关注中美中心。

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走进了高华的世界。我曾经学过一些中国历史课程，但高华的课让我感到惊叹与兴奋。我们学习现代中国的各种思想辩论以及其历史背景。中国从晚清到二十世纪末经历了巨大动荡，其影响最为重大。在高华的课上，我们的讨论与辩论多过当年其他任何的课程。即便在1990年代，关于1850年代或1920年代的辩论，不仅对中国人意义重大，对我们寻求改良美国社会的美国人来说也依然重要。

二十多年后，我已经不记得所有的辩论与观点，但是那场80年代早期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论让我记忆犹新。高华布置我们阅读苏绍智探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。苏认为，“早期的马克思”强调在资本主义下，人被“异化”成机器，而人必须从异化中解放出来。

毫不意外的，我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是：“异化”是否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，它是否也可能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？作为一位学者和一个人，高华的理想是消除“异化”。他的作为超出了他应尽的责任。

课程本身仅仅是一个开始。高华不仅在规定的办公室接待时间与学生讨论，也邀请学生和朋友到他在上海路的狭小宿舍里做客。他的宿舍严重

的年久失修，厨房小得难以容下两人，卫生间让人不想多呆。陈旧的陋室中，狭小的书房却别有洞天。几个书架上满是书刊，一摞摞的《新华文摘》和《读书》杂志堆在门口。一个小录音机，用来听古典音乐。

每个月我差不多拜访高华一两次，有时他邀请，有时我不请自到。他一边抽着香烟，我们一边聊，内容从课程到海阔天空。如今我自己也是一名教授，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时间，我实在无法想象当年高华为那么多的学生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。也许对他而言，学术不仅限于研究，更是传道解惑，建立学术社群。

我在“中心”最重要的经历是在高华指导下完成关于“新权威主义”的独立研究。“新权威主义”者认为中国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权威主义，当时该思想日渐流行——这一思想至今仍大行其道。高华热心地介绍上海学者萧功秦给我认识。我的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次访谈就是对萧的访谈。必须承认，高华对我的报告并不满意。我在报告中加入了我对当时中国政治状况的感受，使用了一些严厉的言辞。高华说，重要的是态度要冷静、事实为重点、分析要准确。这样，读者会理解，也会尊重你的想法。

与其他许多学者不同，高华既是我的导师，也是我们全家的朋友。他邀请我和妻子到他家做客，故也认识了他的夫人刘韶洪和儿子高欣。他们对我 and Mary Beth 都相当友善。那不是出于礼貌，而是真诚地关心我们全家每一个人。我们离开南京前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两家人一起吃“长寿面”，相约永远保持我们的友谊。

1992年6月我离开了南京，但高华从来没有从我的世界中离开。此后的十九年时间里，我们通过信函、电话和见面保持联络。这十九年中有美好的时光，也有令人不安的日子。

1994—1995年，高华由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邀请来美国访问一年。我原来期待这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虽然高华也访问了几位学者。不过提供给他的生活补贴少得可怜，而且邀请方也没有给他提供办公室。结果他也只去过高级国际研究院几次。他住在华盛顿

最糟糕的一个街区的一个狭小昏暗的小公寓里，可能比他在国内的宿舍还要恶劣。有一次我开车送他回住处，发现军警在街头布防，警灯通明。基本上可以说军警与犯罪分子处在战争状态，他们必须出现在街头以维持秩序。这就是高华所亲身经历过的美国。更糟糕的是，高华的一个室友在送中餐外卖时遭遇事故，被公交车撞死。高华不得不负责后事，与中国大使馆联系，将室友的骨灰送回中国。

尽管这些经历很艰难，我相信他都有准备，因为他不仅熟读历史，而且他曾经经历过毛时代和文革中最黑暗的岁月。所以他积极地面面对、忍受几乎任何考验。

高华坚韧不拔。在我1991年到南京前，他就已经开始对延安时期的研究。十年后，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》终于出版。这是一部真正的巨著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剖析中共党史上关键的一幕。当然，这本书并不能讨好官方，甚至他自己的大学。不过，这些人并不是他期望打动的读者。在此后的研究与写作中，高华继续保持着最高的学术水准。

作为最优秀的学者，高华赢得了巨大的尊重。作为一位学者与个人，高华的真挚堪称楷模，令人景仰。

今日中国处处陷于“竞争”之中。中国与其他国家竞争发展，中国人与其他中国人竞争更好的工作，更好的房子，更好的手机，更奢华的服装，与更美好的未来。竞争无所不在，以至于人们有时遗忘了最根本的一点：大家都是平等的、相互依存的人。

虽然高华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他消除人类社会与学术圈的“异化”的理想将长存。我们所有曾经有幸认识高华的人都有责任让他的理想薪火相传，为了他，为了对他的纪念。